

watch| 上证观察家

货币政策应尽快走出弱化困局

□王彤

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政策的转型,货币政策开始逐渐担负起更重要的调控经济的任务,但是由于利率和汇率等调控手段还不成熟,因此货币需求及相关影响因素仍然是大家密切关注的问题。从2005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渐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目的在于处理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由于前期广义货币增长较快,因此仍有大量过剩资金支撑着狭义货币的上升势头,表现为广义货币增速下降,狭义货币增速持续提高,二者增幅差距逐步缩小。

进一步考察影响我国货币需求有关因素可以把这个现象看得更透彻。一是经济总量,我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狭义货币增长率提高1.666个百分点,带动广义货币增长率提高1.69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经济总量与货币之间的紧密关系,表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处于上升状态。二是利率,从短期来看,我国的名义存款利率变动对狭义货币增长率的波动呈-0.013个百分点的影响,对广义货币增长率的影响仅为-0.0084个百分点,对广义货币增长率的影响也只有-0.0086个百分点,这两者

从2005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渐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目的在于处理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由于前期广义货币增长较快,因此仍有大量过剩资金支撑着狭义货币的上升势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的名义利率非市场化,二是我国的资产结构比较单一,三是预期通胀率发生了作用。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效果,一是加快利率改革进程,二是推动债券市场健全制度、扩大规模,三是完善货币政策的形成机制,四是建立内外经济、金融协调机制。

均处于低水平。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名义利率非市场化,这种体制性名义利率并非市场利率那样随通胀率进行调整,不能够很好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二是这一时期资产结构比较单一,货币的替代资产种类缺乏,并且货币资产向其他资产转化的交易成本较高;三是预期通胀率发生了作用。消费价格指数每提高1%,将带动狭义货币增长率下降0.006个百分点,带动广义货币增长率下降0.003个百分点,表明预期通货膨胀的提高刺激市场主体倾向于持有更多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从而抑制了货币的增长,但是总的来看对货币增长率的影响较弱,这与造成货币利率弹性低的原因是一致的。

通过对货币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制度约束。由于我国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各方面制度建设进程对货币需求影响较为复杂,货币政策面临的倒逼机制也使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不稳定,而短期且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中介目标(体系)。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约束。主要包括:第一,受金融体制和金融结构因素制约,我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利率弹性较低;第二,我国的汇率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货币政策主要目标只能暂时放在防范金融风险 and 减轻货币政策执行中的外部压力方面;第三,资本市场面临紧迫的制度建设问题,其资源错配置作用存在较大偏差。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效力仍主要依靠信贷途径传导,但这条路子的主动权掌握也随着金融改革步伐加快开始转移、分散,从

而造成货币政策效力减弱。

三是货币政策与政府多目标约束存在矛盾。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离,但由于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仍然被纳入政府整体的工作范围内,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其他目标干预、挤压,货币政策独立性差问题大大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力的发挥。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仍然较弱,货币需求与利率变动关系并不十分紧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都与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化相关,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效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首先,着力加快利率改革进程。在现有制度的约束下,货币政策体制应当主动寻求突破,具体来看就是要选择和培育新

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是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相符合的。中央银行应该遵循已定的利率改革方案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定为以利率为主,其他多种指标,包括市场利率、信贷、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情况等为辅的一篮子目标。

其次,推动债券市场健全制度、扩大规模。利率市场化是在加强中央银行对利率的市场化干预能力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必须同时进行债券市场改革,完善市场利率形成机制,建立由中央银行掌管的基准利率,这样才可能促进货币对利率调节的敏感度逐步提高,从而强化货币政策效力。

再次,完善货币政策的形成机制。我们可以借鉴有关国家的经验,通过一些改革举措尽量减少政府对货币政策的过多干预。一是使货币政策委员

会独立于政府序列,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二是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构成,从以政府官员为主向以货币金融领域专家、行业人士为主转换;三是增加货币政策当局与公众的沟通,逐步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四是加强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监督,保证货币政策能够对市场发出有效的信号,最终为经济稳定创造条件。从中长期角度来看,这是培育规范的货币政策规则、增强货币政策规律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效力的正确选择。

第四,建立内外经济、金融发展协调机制。作为机会成本变量之一的汇率应当基本反映出国内外经济的对比关系,如果存在较大偏差则会导致内外经济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存在,表现为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内外经济、金融发展不协调在短期内会对货币政策效果造成大的冲击,在长期内则由于货币政策应急使用控制贷款等手段,也会阻碍利率改革。因此,必须通过外贸外资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扭转这种失衡,避免给经济中长期发展埋下大的隐患。

(作者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voice| 上证名记者

经济调控难度进一步增加

□倪小林

刚刚进入新年,市场的变化就令人惊叹不已。由此很多经济界人士出言,调控难度还在增加,2007年更加考验我们对于开放经济的驾驭能力。

刚刚跨进2007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就爆出惊人消息,五环以外的房子每平方米已达8000元。其实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条已经迟到的消息,2006年下半年北京五环以外的一些小区房价就已经提高七八千元了,年底有的房价已达万元以上。不过见诸报端的这条消息,至少告诉人们宏观调控的效果值得监测。随之而来的股市上涨,开年就创下历史新高,投资者欢欣鼓舞,新股民积极入市,有报道称贷款炒股已经变相死灰复燃。

能够迅速分流金融流动性过剩的两大市场,新年新气象表现不俗,不过对于如此快的市场变化,不少人开始忧心忡忡。如今在经济学界已有明显相左的意见在评价以上两个重要市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两大市场活跃,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因为中国资产对全球资金产生了浓厚的吸引力,热钱纷纷在这里赶,外来投资者最感兴趣的两大市场,也是房地产和股市。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中国资产价格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增值。加上连续几年的熊市,国内投资者缺乏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渠道,如今出现的银行储蓄“大搬家”当属正常。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这两大市场正在积累泡沫,有经济界人士提出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演的预言,对股市的大幅走高更是继续不断。中国社科院近日发表的黄皮书,还提示我们要警惕日本曾经因房地产泡沫引发长达十年的经济低速局面在中国重演。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第三种意见,那些海外的机构对于中国经济2007年的评价更是五花八门,主流意见一再提醒我们,美国经济依然走低,会牵制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也是联合国在2007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述的:世界经济保持了连续3年的历史性高速增长之后,今年的增速将放缓至3.2%。

当然我们可以对这些看法和预测再作质疑,但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

一是流动性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有没有如此大的市场和能力消化它。从海外资本的流入看,现在希望投资中国的大有人在,进来的资金也是各式各样,如果说美国的养老基金都对中国市场跃跃欲试,我们就不能不更多关注流入资金的目的了。尤其是在投资与投机混淆不清的时候,政策容易在人们一头雾水下失灵。

二是多种利益的博弈会愈加激烈,每当我们对打开互联网和报刊的时候,总会看到人们打房价、股价甚至油价的高低或在喋喋不休地争论,比如,宏观调控政策重拳出击的房地产,是地价推高房价还是房价拉升地价,两种意见的代表正是两个不同社会层面,来自市场的力量与政府调控措施的博弈至今没有停止,而且从年初房价继续攀高看,这样的博弈还会继续。由此,如果多方博弈升级,必然增加调控难度。

三是来自市场的力量将随着我们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而不断加大,最近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业务迅速提升,金融产品的灵活性大大高于我们本土金融行业;外资进入国内重要产业的企业,国内企业的并购虽然活跃还是难敌外来雄厚的资本等等。市场的门一旦打开,来自市场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大,还会带来更多复杂的问题。

设警务所就能解决医患纠纷吗

□陈君

据新华社报道,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与闵行区莘松派出所共同建立了闵行区莘松派出所闵行区中心医院警务所,旨在维护医务人员和病人的合法权益,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

不可否认,建立警务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警务所是医院和派出所共同建立的,这种设置本身就决定了,它要想赢得患者的信任有着相当的难度。

医患矛盾之所以激化,根源就在于医患双方缺少起码的信任基础,双方无法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在医患矛盾中,医院处于强势地位,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卫生主管部门、医疗鉴定部门与医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患者的维权成本高,且难以得到公众的裁决。在这种情况下,患者通过正常途径常常无法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得不投向“医闹”,使医患之间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避免医患矛盾激化,很大程度上在于卫生主管部门、医疗鉴定机构和司法机关在医患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医院警务所能否在医患关系中起到平衡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发挥作用的根本。倘若警务所不能客观地充当第三方的角色,公正地对一些医疗纠纷进行裁决,而是陷入对某一方利益的代言人,就可

能使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使医患之间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

实际上,单靠外力难以真正解决好医患矛盾,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连续八年“诚实度和伦理度”调查中,护士均占据榜首。在全国职业道德评价最高的前五名均为医护人员。根源在于,美国对医疗领域的资金投入充足,医生只需负责治病救人,毋需担忧医疗费问题和自身收入问题,这使得医生的角色得到了充分而完整的体现。

在我国,财政对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数据显示,在我国目前总体的医疗费用里面,政府支出只占17%,非常低。而美国政府支付的至少占总费用的45%,几乎是中国的三倍。即使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也达到了27%。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在市场化改革以后,医生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要救死扶伤,体现医生角色。另一方面,他又为医院创收,体现商人角色。这种原本矛盾的角色集中在医护人员身上,导致了这一群体职业道德的集体错位,逐渐失去了患者的信任。

如果我们的医疗投入逐渐增加,医院的盈利压力大为减小,其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职业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我国的医患关系也能重新步入和谐状态,这或许比设立警务所要有效得多。

让环保风暴成为监管常态

□姜松

继2005年、2006年两次环保风暴之后,本月10日,环保总局发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1123亿元的82个严重违法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对唐山、吕梁、莱芜、六盘水等4个城市及国电集团等4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以遏制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

近年来,环保问题欠账很多,许多指标未能完成,个别指标不降反升。据国家环保局估计,中国环境问题所造成的总损失将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目前,我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环境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5亿元。

环保欠账是要还的,而且可能加倍偿还。在目前的所有问

题当中,环保问题是最应该被重视的问题。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是“政府不作为”和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乃至暗地纵容,在以GDP为标准衡量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下,官员的自觉是靠不住的。鉴于环保的严峻形势,仅靠几次风暴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需要加大监管、治理、问责力度,认真落实每一个具体指标,严厉查处每一起污染事件的责任人,确保环保监管、执法的连续性,让人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污染环境的严重后果,促使官员们真正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抓。

环保风暴只有成为常态,才能真正具有威慑力,也才能使他们放下侥幸心理,真正去认真对待。至少要做到,对任何一个试图通过污染环境换取政绩的官员来说,环保风暴都将随时发挥其威力,令其付出惨痛代价。

事实证明,一两次环保风暴官员并不害怕,他们真正害怕的是环保风暴长刮不止。

社保监管体系需推倒重建

□冯玉国

“社会保障监督与管理部缺乏独立性,‘左手管右手’的管理架构使监管职能无法发挥。”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德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再生指出,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关和基金管理机关合一、只对上级负责的行政架构,是当前一些政府官员贪污挪用老百姓“养命钱”能够得逞的体制漏洞。

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透露,截至去年8月底,全国社保基金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300亿元人民币,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截至2005年底,国内个人账户“空账”已高达约8000亿元,并以每年约1000亿元的规模迅速扩大。对社保基金而言,面临着两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安全问题即监管问题,二是保值增值问题,安全问题是前提,如果资金安全都无法保障,保值增值也就无从谈起。

如果是在至关重要的社保基金安全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漏洞,导致大案迭发,我们现行的社保基金监管机制,是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



刘道伟 制图

业保险条例》建立起来的。条例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这样,实际上将社保基金的管理与监督的双重责任,其系于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了。

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的法规不健全,且法规层次不高,无法产生出有效的制约和规范力量,因此造成了监管成本的居高不下和监管效率的低下。据统计,我国社保基金

的管理成本为3%,而国际上一般是1%左右,而社保基金大案的不发生,也证明了这种监管效率的低下——根本无法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

所以,要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必须制定一部完整而规范的社会保险法,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完善、科学的监管体系,以从根本上改变“左手管右手”的监管框架。倘若没有一部完整的社会保险法,作为监管基础的,目前的监管体系只能是修复性变化,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完善。

以美国为例,早在1935年,它们就制定了《社会保障

不能无视 GDP 增长背后的沉重代价

□邓聿文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日前在作“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报告时表示,初步测算,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5%;财政收入达3.9万亿元,增收7000多亿元;物价保持基本稳定。2006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别实际增长6%和11%。

仅从这一份成绩单看,“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表现的确可喜可贺。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比如代价方面——来看一看,形势恐怕就不那么乐观了。马凯就提到,付出的代价过大,不稳定不协调的因素较多。虽然马凯没明确说明付出了哪些代价,但我们大致可估算一下。

一般来说,社会发展要付出四种代价,即投入性代价、目标限定性代价、牺牲性代价和失误性

代价。第一种代价指的是人类要实现某种或某些发展目标而必须或必要作出的投入或付出,这是最基本的成本意义上的代价。第二种代价则是由于选择了优先需要关注的主导性的发展目标,从而导致了对其其他有益的发展目标的抑制、损害甚至丧失。第三种代价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发展或少数人的发展总是出现个人或多数人利益被损害甚至生命被牺牲的普遍情况。最后一种代价指的是由于人的错误或主观失误所造成的背离自身价值取向的或原本就不该发生的消极后果。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即使在投入性代价方面,付出的成本也太多了。

资源和环境即是一例。国内学者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就指出,

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另据中科院测算,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可以说,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不是因为开发多了,而是开发粗了;不是现代产业多了,而是原始产业惰性大了;不是开发过头了,而是开发失当了;不是不该开发,而是不该乱开发。

不该付出的代价则以新双轨制下的腐败和管制最为突出。所谓新双轨制,是区别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旧双轨制而言的,根据学者钟伟的解释,它指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巨额的“租金”,即人们通常说的“寻租”。这个“租金”从哪里来?它存在于已经市场化的商品、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之间。青年经济学家高辉清

等三位博士对2004年由于腐败和管制导致的损失进行了详尽的估算。结果显示:在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腐败和管制的窟窿为4678.07亿元,占当年GDP现价比重为29.3%,这一规模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的1.5倍。

这种体系性的腐败和管制造成的恶果之一,是严重扭曲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去年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家庭中最低收入的10%人口(约1.3亿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这表明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是以部分人群更加贫困为代价的。这个报告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长期维持的时间还不到25年,经济增长率也不如中国高,但是两国先后都步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而中国长达近30年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却越来越严重,增长成果如同注入到沙漠中的河流,消失得无影

无踪。原因无他,正如三位博士的研究所指出的,它们变成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超豪华办公楼、政府公款、资金外逃、来历不明的个人巨额财产等。可见,中国经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几乎可以完全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进。

经济增长的代价还包括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每年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以及因诚信缺失而引起的巨额的交易成本,等等。代价过大,特别是发展代价与收益代价之间出现的严重的反差背离,将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而且从根本上将颠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正当性。过去我们相信,只要经济增长最终能够让每个人都受益,改革就是利大于弊。但现在,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民众对本国经济的担忧情绪却日益升温。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增长的代价问题,并对现实中代价与受益间出现的反差背离现象,设法予以纠正。